

# 评康熙时期的选词标准

陈水云

**作者** 陈水云, 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, 武汉, 430072

**关键词** 康熙时期 选词标准 抒情 醇雅 艺术质量

**提要** 明末清初, 浮艳词风颇为流行, 到康熙年间经过词人的反拨, 清代词坛出现中兴鼎盛的局面, 康熙时期的选词风气就形成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。在编辑词选的过程中, 因受康熙文化政策的影响, 人们采取了不同的选词标准, 前期重视主观性情的抒发, 中后期则标榜醇厚雅正, 要求符合封建伦理规范。然而, 不管采取何种选词标准, 人们都能坚持以艺术质量来取舍词的原则, 反对以习好选词、以交情选词、以刻资选词乃至以选词取悦贵人的不良习气。

据龙沐勋先生分析, 词之选本初期目的在便歌, 或在传人, 到清代人们编辑词选则是为了标宗立义, 推行自己的词学主张<sup>①</sup>。而选词宗旨的变化即始于康熙年间, 康熙时期的人们为转变明末以来词坛浮艳风气, 通过编辑词选引导人们的创作走向, 同时也有意识地传播自己的词学思想。然而,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, 康熙年间的这些词选, 前期以今词选为主, 中后期虽有少量今词选面世, 但古词选却逐渐多了起来, 这种前后期选词重心不同的现象, 所表征的选词标准及审美祈尚的异同, 是我们此文所要探讨研究的内容。

## 一、选词标准提出的背景

康熙时期人们选词标准的提出, 是建立在对明末清初词坛现状批评与反思认识的基础上的。

康熙词坛是紧承顺治发展而来的, 顺治时期词风明显受明末侧艳风气的影响, 词人们填词多以《花间集》和《草堂诗余》为习摹范本。当时活跃在词坛的是西泠派、毗陵派与广陵派, 陈撰《樊榭山房集外词题辞》云: “近称西泠派, 或踪迹《花间》, 或问津《草堂》, 星繁绮合, 可谓极盛。”毗陵与广陵词坛的作者如王士禛、邹祗谟、董以宁, 也是从《花间集》入手而有明人余风遗韵, 谢章铤《赌棋山庄词话》卷八说王士禛“沿凤洲(王世贞)大樽(陈子龙)绪论, 心摹手追, 半在《花间》”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谈到自己与董以宁初学词即是摹仿《花间集》及《花庵词选》、《六十家词》, 沈雄《古今词话》引黄周星话说邹、董曾分赋十六艳词, 今存邹祗谟《丽农词》有《惜分飞·本意》十六首, 王士禛以“缠绵欲绝, 动魄惊心”评之<sup>②</sup>。

步趋明人余绪, 习摹《花间》《草堂》, 结果是浮艳之风渐以弥漫词坛。浙东词人方炳说: “词至今日, 流靡已极。闺帷房闼之间, 作者非冶容不言, 选者非目桃不录。”<sup>③</sup>对治艳风气笼罩词坛的局面, 陈维崧、朱彝尊、纳兰性德是深表不满的, 希望通过选词来转变之。陈维崧在《今词苑序》中批评当时学为词者“矜香弱

为当家,以清真为本色”,或“神警审声,斥为郑卫”,甚或“鬻弄俚词,闺襜治习,音如湿鼓,色若死灰”,他与吴本嵩等忧于词坛不振之状而编选了《今词苑》。纳兰性德没有直接说明自己编选《今词初集》的意图,但毛际可在《今词初集》跋语中提到:“近世词学之盛,颀颀古人,然其卑者,掇拾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数卷之书。”纳兰性德与顾贞观不满于他们以“骚坛自命”的姿态,意在借编纂此选来铲除他们创作所表现出来的浮艳之弊。朱彝尊则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明代流行词籍——坊本《草堂诗余》,认为古词选本“皆轶不传,独《草堂诗余》所收最下、最传,三百年来学者守为《兔园册》,无惑乎词之不振也。”<sup>④</sup>他最为反感的是《草堂诗余》不选姜夔词,而选取胡浩然《满庭芳·吉席》和僧仲殊《金菊对芙蓉·桂花》,甚至以为“词人之作,自《草堂诗余》盛行,屏去《激楚》、《阳阿》,而巴人之唱齐进矣。”<sup>⑤</sup>因为古词选本难以寻觅,他迫切地感到有重编历代词选的必要,这种责任感使他与汪森共同选辑完成了影响康乾词坛风气的词选——《词综》。

不管是朱彝尊编选古词选,还是陈维崧、纳兰性德选辑今词选,他们的目的都显然是为了起衰救弊,即针对明末清初词坛冶艳风气而来。然而他们还是没有清晰地揭示出冶艳词风的根本性症结,倒是邓汉仪、吴绮、史惟圆等的分析,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确切的答案。归结他们论述的要点,可以知道冶艳词风有以下两种弊端:第一,缺乏真情。受明人词学观念的影响,时人以词为香弱之体,专写俚俗鄙靡之调,没有出自本心的真情。邓汉仪比较今古人创作的不同云:“感旧思离,追欢赠别,怀古忧时,昔人一寓之于词,而今人顾习山谷之空语,效屯田之靡音,满纸淫哇,总乖正始。”<sup>⑥</sup>史惟圆的分析更是击中时人创作的要害,说:“夫作者非有《国风》美人、《离骚》香草之志,意以优柔则涵濡之,则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。”<sup>⑦</sup>所谓“入也不微而出也不厚”,是指人们的创作缺乏深厚的感情底蕴,写出来的作品不象《风》《骚》那样有寄托,而徒存华丽浮靡的艳体形式。第二,模仿前人,失却个性。宋词有如唐诗,达到创作的顶峰,后来者难以逾越,便转而学习模仿,这本是文学发展上的普遍现象,但明末以来的填词者只是一味模仿,不敢创新,踟躅于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的狭窄视野里。周在浚便批评他们只能“依人匍匐”、“堆垛”,毫无自己的个性可言<sup>⑧</sup>。吴绮描述这种无个性的创作云:“本是清羸之疾,回身谬作纤腰;原无袅娜之容,曳足阳称巧步。宁知神如处子,曾何藉于矜持;婢学夫人,只益形其羞涩。于是俳谐杂进,图画靡真。”<sup>⑨</sup>以东施效颦、婢学夫人来比喻模仿前人的现象,的确是切中时弊。而陈维崧、朱彝尊、纳兰性德对词坛冶艳风气的批评,当是对此二弊而发的,他们的选词标准也应是在对这两种弊端反思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。不过因各自词学观念的差异,及前后期情势的不同,他们在具体选词标准上又有了各自的祈尚,即前期选词重视主体内在性情的抒发,中后期则要求符合社会群体的外在伦理规范。

## 二、前期选词重视性情的抒发

康熙前期选词重视主观性情抒发,是与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及康熙执政初期“宽大平和”的施政方针相联系的。玄烨是康熙六年亲政的,但实际执政则在康熙八年逮捕鳌拜后。执政伊始,形势不容乐观,“时海内新定,明室遗臣,多有存者,居恒著书言论,常慨然有故国之思。”<sup>⑩</sup>况且当时去明未远,明代结社风气仍然存在,杨凤苞《书南山草堂集》云:“明社既屋,士之憔悴失职、高蹈而能文者,相率结为诗社,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。”特别是四大臣辅政时期所制造的奏销案、通海案及庄廷铨明史案,给江南士子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。为缓和曾经激化的民族矛盾,玄烨改变过去严厉打击的措施,推行了不少笼络汉族士子的怀柔政策,如诏举山林隐逸,扩大科举取士名额,设立博学宏词科,重开明史馆,吸收汉族士子加入到他们的统治阵营里。在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,康熙词坛暂时地出现以词写心的现象,近人叶恭绰概括此时作品的特点是:“家国文物之感,蕴发无端,哭啼非假。”<sup>⑪</sup>它们有的抒发了人们的故国哀思,有的反映了易代鼎革的惨痛历史,这种创作倾向所折射出来的词学思想,自然成为人们编辑词选的重要标准。

实践决定着思想观念,康熙初年的创作实际也影响着人们的选词标准。如陈维崧谈自己编选《今词苑》的入选标准是“存经存史”,所谓“存经存史”是指所辑录的词有深远的寄托,反映出重大的社会内容,可以

当作经书或史书来读解。《今词苑》收录的是康熙前 10 年的作品，大都表现的是作者愤激不平之声或故国之思，鲜明地印证了陈维崧的理论主张。此主张的理论内核是张扬词直抒性情的本体功能，意在扩大词的题材范围，这也是当时选词者的共同看法。如吴本嵩《今词苑序》云：“虽欢愉述景，妮好言情，终觉默默与愁相会。……大抵诗贵和平浑厚，虽言愁之作古今不绝，而缠绵凄恻，如诉如慕，莫若诗余之言愁可以绘神绘声。”那末《今词苑》的标准也可以说是“选愁”了。纳兰性德也说过“诗亡词乃兴，比兴此焉托。往往欢娱工，不如忧患作。”<sup>⑧</sup>又毛际可为《今词初集》所作跋语，述及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编纂此选的宗旨：“今梁汾、容若两君权衡是选，主于铲除浮艳，舒写性情。”这“舒写性情”即是纳兰性德的入选标准，其具体涵义应该是指表现忧苦愁思的情感内容，考察《今词初集》所录陈子龙、吴伟业、龚鼎孳、曹溶、李雯、宋征舆之词也皆是忧愁之声。周在浚有《贺新郎》词谈到他编纂《古今词汇》的宗旨，认为选词不应使创作源头涸竭，要广泛搜求前人好词，存大雅，去陈腐。同时，他又反对模仿前人，更反对以艳词为雅，而主张“夏夏陈言之务去，看谁能自把胸怀写”<sup>⑨</sup>，这便是他的入选标准。不过与他共辑《词汇》的卓回在最后定稿时删去了周在浚主张入选的作品，使我们今天无法验证周在浚的标准是如何体现在词选里的<sup>⑩</sup>，但通过分析周在浚自己的创作，依然可以把握到他的标准具体要求还是表现故国之思与生民之苦。

陈维崧、周在浚、纳兰性德选词以抒写性情为准的，反映了他们重视个性与强调独创的词学思想。明末清初浮艳词风所以风行，很重要的原因是受云间派复古思想的影响，如蒋平阶论词力持复古，主张学习五代北宋，其弟子沈亿年甚至要求屏去宋调，只取晚唐五代之制。这显然不符合词之发展实际，故招致同时人的批评和非议。曹禾《珂雪词话》云：“云间诸公论诗宗初盛唐，论词宗北宋，此其能合而不能离也。夫离而得合，乃为大家，若优孟衣冠，天壤间只生古人已足，何用有我？”陈维崧没有直接批评云间的言论，但在《胡二斋拟古乐府序》中讲创作要力求独创，认为早期乐府如《企喻》《读曲》各不相袭，更无定制，后来者如果去模仿前人之作，只能是“幡绰只效颦之技，郭郎为借面之妆”，他主张“别裁伪体，直举天怀；纬昔事以今情，传新声于古意；绝无依傍，略少抚摹。”周在浚在论述性情的涵义时，指出不同时代或地域的人有不同的性情，如《鲁风》与《卫风》所言情不同，卿大夫之作也不同于闾巷歌谣，陶谢扬镳，李杜分轨，也是因为“各随其性情之所在”。所以说：“古无无情之诗词，亦无舍性情之外别有可为诗词者。若舍己之情性而强从人，则今日之学，所谓优孟衣冠，何情之有。”<sup>⑪</sup>顾贞观是纳兰性德研习词学的引路人，也是《今词初集》的选辑者之一。他在《十名家词序》中谈到自己论词宗南唐二主，却更欣赏亦园（候文灿）《十名家词》选词能“不执己，不徇人，不强分时代”。又在《与陈栩园书》中向纳兰性德转述了其师曹溶教导他的话，要求纳兰性德“不学步古人”又能“变而谋新”，而自己亦以“不落宋人圈襍”来自勉，提倡自出机杼，追求清新自然。这些都表现出他力主独创不落窠臼的创新精神。正因为有独创意识，虽然同是主张抒写性情，但陈维崧与顾贞观、纳兰性德在词风上迥乎不同，前者豪放雄奇，雄深苍稳，后者则哀感顽艳，婉丽凄清。

### 三、中后期选词标榜醇厚雅正

以抒情为宗旨的选词标准，是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尚处动荡状态的产物。到清朝统治地位日益巩固的康熙中后期，它就越来越显示出其与时势的不适应性，而符合封建统治者要求的标榜醇厚雅正的词学观念逐渐取而代之，成为康熙中后期人们编辑词选的重要标准。自康熙二十年三藩乱平，两年后台湾回归，清代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，清朝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心也相应地由军事转向经济、文化、政治领域。康熙对文化领域的治理，是采取本末兼治的办法来实现的。首先，从根本上兴礼崇儒，提倡程朱理学，建立伦理纲常。玄烨为此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经筵大典，南巡时还特地过曲阜，谒孔庙，又把朱熹从孔庙两庑的先贤中抬出，放在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，以朱熹四书五经注释作为清代科举考试的依据。其次，借编纂图书来箝制士人思想，将图书整理范围由经史方面扩展到诗文、音韵、性理、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地理及名物汇编等领域，编纂出诸如《佩文韵府》、《渊鉴类出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古文渊鉴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经典著作。通过图

书的整理编纂工作,一方面让士人皓首穷经,不问世事;另一方面对违背封建伦理有悖统治者意志的书籍予以清除,达到统一言论的目的。康熙文化政策表现在文学方面就是提倡“清真雅正”的批评标准,以儒家的诗教为旨归。因此,避开现实内容,寻求古人法则,标榜醇厚雅正,成为编辑词选者的首选标准。

标榜醇雅的宗旨最初体现在朱彝尊与汪森共辑的《词综》里。汪森在《词综序》里回顾词的发展进程后,认为西蜀、南唐以后作者日盛,曲调愈多,流派因之而别,但“言情者或失之俚,使事者或失之伉”,只有到南宋“鄱阳姜夔出,句琢字炼,归于醇雅。”朱彝尊还把这种标准的渊源追溯到宋代,认为宋人选词标准即在雅。如曾慥《乐府雅词》、同阳居士《复雅歌词》、周密《绝妙好词》皆以雅为尚,说“言情之作,易流于秽,此宋人多以雅为目。”<sup>⑧</sup>宋人词选当然不全是尚雅的,朱彝尊只不过借此来标榜自己的词学观念,《词综》便是他“以雅为尚”观念在选词方面的践履。《词综》凡36卷,收词2200余首,作者650余家,词作入选率以姜夔为最高,在他看来“填词最雅无过石帚”<sup>⑨</sup>,其次是周密、吴文英、张炎等以雅为尚的词人,而苏轼、辛弃疾、秦观、柳永等著名词人入选量则较少,而且在选目上也是尽量收录“字雕句琢,归于醇雅”的作品,这正符合他提出的选词当“务去陈言,归于正始”的要求<sup>⑩</sup>。后来《词洁》和《御选历代诗余》也是遵循这样的入选标准。先著在《词洁序》里谈到词洁的涵义,说“词洁云者,恐词之或即于淫鄙秽杂,而因以见宋人之所为,固自有真耳。……悬古人以为之归,而不徒为抟土剪彩者之所为。”他反对明末以来侧重于“韵”与“艳”的倾向,认为“韵则近于佻薄,艳以流于褻”,往而不返,其去吴骚市曲无几”,只有宋人的词才符合雅洁的标准,如“美成之集自标清真,白石之词无一凡近”即是明证<sup>⑪</sup>。玄烨为《历代诗余》所撰序讲到 he 向词臣们提出辑录词选的要求是“辑其风华典丽,悉归于正者”。又认为过去孔子编纂《诗经》的标准是“思无邪”,那末这部《历代诗余》所辑录的“含英咀华,敲金戛玉者,何在不可以思无邪之一言该之也。”

朱彝尊标榜的醇雅,就是他在《词综发凡》中所说的:“温雅芊丽,咀宫含商。”他又在《孟林彦词序》中谈到醇雅的具体要求云:“去《花庵》《草堂》之陈言,不为所役,俾滓腐涂濯,以孤技自拔于流俗,绮靡矣而不戾乎情,镂琢矣而不伤夫气。”但通过分析朱彝尊的诗论,可以知道醇雅的实质是适应封建统治者的要求,宣扬儒家的诗教传统,强调言情不轻佻,出辞不陈俗,思想醇正,不怨不怒,中正平和。如他评钱芳标之诗云:“其辞雅以醇,其志廉以洁,其言情也绮丽而不轻佻,信夫情之挚,而一本乎自得者欤!”<sup>⑫</sup>朱彝尊醇雅说所蕴含的儒教思想,在康熙中后期是人们普遍认同的看法。如宋荦即是将词与儒家的诗乐观相联系,认为古之圣人悬《六经》以垂教,惜乎古乐没有流传下来,但蒋景祁所编《瑶华集》却能使人知乐,因为词作为由古乐发展下来的文体形式,在宋代不但受帝王们的重视,而且也得到象胡致堂、朱晦庵这样大儒的首肯,可见它是有裨于乐教,有助于感化人心的。“而今日诸名家之词,可任其湮没弗传矣?审音知乐必有取乎尔也。”<sup>⑬</sup>玄烨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,更是从礼教方面来看待词的社会功能。他认为诗余来源于诗,乃古乐府之遗音,它权舆于唐李白、刘禹锡,到宋经过周邦彦的制律,柳永的拓展,“一时绮制,可谓称盛”,虽然体殊于乐府,但“于古者依永和声之道间有合也”,“推此而沿流讨源,由词以溯诗,由诗以溯之乐,即箫韶九成,其亦不外本人心以求自然之声也夫。”<sup>⑭</sup>玄烨着眼点是由词可上溯到诗到乐,亦即可与诗与乐相通,能继响古代的诗乐,“有关政教而裨益身心”。到乾隆年间,浙派词人王昶将这种诗教说系统化,从词的音乐性与思想性方面论证词乃《三百篇》之遗,并以此为依据来说明词继承了《三百篇》的雅正传统。

#### 四、坚持以艺术质量选词的原则

选词者选词除了选录符合其入选标准的作品外,还得考虑其词选能否反映词坛创作的实际风貌。如胡德方序《绝妙词选》称其“博观约取,发妙音于众乐并奏之际,出至珍于万宝毕陈之中。”朱彝尊与汪森合编的《词综》是继承了宋人这个优良传统的,它不但重点选辑了南宋及历代雅词,而且也入选了唐宋以来大部分名家名作,真正做到了“搜罗既广,潜隐靡遗”<sup>⑮</sup>。但纳兰性德对此词选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,说“愚意以为吾人选书,不必务博,专取精诣,杰出之彦,尽其所长,使其精神风致涌现于楮墨之间。每选一家,虽多

取至十百无厌，其余诸家不妨黄茅白苇，概从芟雉。”<sup>④</sup>可见，他以精亦即艺术质量作为取舍词的原则，而反对搜罗无遗的做法。纳兰性德曾与梁佩兰（药亭）商量合选宋词，意取北宋的周邦彦、苏轼、柳永、秦观、贺铸，南宋的姜夔、辛弃疾、史达祖、陆游、吴文英、王沂孙、张炎等名家，其余各家则“取其词之至妙者附之”。惜乎这部词选未能完成，但通过所编《今词初集》选录情况来看，他重点编辑了陈子龙、吴伟业、龚鼎孳、曾溶、王士禛、陈维崧、朱彝尊等名家的作品，从明清之际几百位词人里仅选取为数不多的几家，可见出他是坚持了“专取精诣”的择录原则。《瑶华集》的编纂者蒋景祁也声明他的词选既不同于《啸余谱》“要取备体”，也不同于周《词纬》“网罗今古，分别源委，富至二千余叶”，“此集专于采词，词工者，一调累至百十阙，而否则阙焉不收。”<sup>⑤</sup>当时著名词人陈维崧入选 148 首，朱彝尊入选 111 首，他如史惟圆、曹溶、曹贞吉、纳兰性德、钱芳标、吴绮、邹祗谟、曹尔堪等均入选数十首，大致体现了以“工”即艺术质量择录词的原则。宋荦评价此词选云：“淘汰之精核，搜采之奥博，文人才士，镂肾铄肺之所为，盖靡不具焉。”<sup>⑥</sup>

当时词坛选词之风颇盛，然而不是任何人能贯彻以艺术质量择词的原则，有的人是借选词来沽名钓誉，败坏了选坛的风气。王曰卓《与友论选词书》将当时选坛的不良风气分为四种，分别对它们的弊端作了精辟的分析：（一）以习好选词，即“习周、柳者，尽黜苏、辛，好苏、辛者，尽黜周、柳。”王曰卓认为这有违宋词创作实际，也不符合宋人选词的实际情况，况且苏、辛也有便娟之调，周、柳也有豪宕之音，选词切不可执一以概有，正如奏乐必八音竞奏然后可以悦耳，调羹必五味咸调然后可以适口。（二）以交情深浅选词。“若夫交深者，词虽不工，亦选至什至百；交不深者，词虽工亦不过二三。爱者存亡，憎者删之。”（三）以刻资厚薄选词。“有资者，词固不工，亦可不论交，必列如数；无资者，交且不论，又何暇论词，必弃如遗。往往以刻资之厚薄为选之多寡，亦时有以酒席之丰俭为词之去留。”（四）以选词取悦贵人。“有名登仕版，毋论素不工词，并不知词为何物，亦必多方伪作，以存其名；若韦布之士，毋论词所素工，且有全稿，或有刻本，必相让议曰：是非香奁语也？是为应酬作也？概置不录。”王曰卓分析这类选词者的心态，无非是想取悦于贵人，然贵人喜好却不在此，自然也不在乎刻名的多少，同时又使韦布之士对之怨恨入骨，最终是双方都未能尽心如意。在批评几种不良习气后，王曰卓提出自己选词的主张，要求操选政者“毋以己意横于胸中，第就本集孰佳孰尤佳，细如论定，则便娟者无失其为便娟，豪宕者无失其为豪宕，合苏、辛、周、柳于一堂。”这样的选录原则也是当时优秀词选的经验总结，对当时选坛有指导意义，对今天操选政者来说仍是精当的论断。

#### 注 释：

① 《词选标准论》，《词学季刊》一卷二号。

② 《词苑萃编》卷十八

③ 王曰卓：《南窗文集》，卷五跋语。

⑤ 《书绝妙好词后》，《曝书亭集》卷四十三。

④ ⑬ ⑭ 《词综·发凡》

⑥ 《十五家词序》

⑦ 陈维崧：《蝶庵词序》，《迦陵文集》卷二。

⑧ ⑫ 《贺新郎·钱塘卓方水年七十，走数百里来白下，觅予合选〈词汇〉，于其垂成，作此志喜再用瑶星韵》。

⑨ 《史云臣蝶庵词序》，《林蕙堂集》卷五。

⑩ 黄鸿寿：《清史纪事本末》，卷二十一。

⑪ 《广篋中词》卷一

⑫ 《填词》，《通志堂集》卷三。

⑬ 严迪昌：《清词史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，第 125-127 页。

⑭ 徐钊：《词苑丛谈》，卷四。

⑮ 《词洁发凡》

⑯ 《钱舍人诗序》，《曝书亭集》卷三十七。

⑰ ⑱ 《瑶华集序》

⑲ 《历代诗余序》

⑳ 《词综后序》

㉑ 《与梁药亭书》，《通志堂集》卷十三。

㉒ 《刻瑶华集述》

（责任编辑 张炳煌）